

恣意“铺摊子”，留下“烂摊子”

贵州两名县委书记落马背后的“政绩工程”歪风



新华社贵阳1月7日电(记者王丽、李惊亚、汪军)近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2019年初,三都县委书记梁嘉庚因犯受贿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

潘志立、梁嘉庚曾在独山县“搭班子”多年。在县委书记任上,两人恣意妄为,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打造政绩工程,如今却留下一片“烂摊子”。

贫困县里的“烂摊子”令人叹息

地处贵州最南端的独山是贫困县,长期以来交通偏远,自然条件差,经济底子薄。2010年7月开始,潘志立在此地任县委书记,他热衷于搞大项目,盲目举债打造多个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记者近日在独山县实地走访发现,潘志立主导的相当一部分工程处于停工状态。位于影山镇净心谷景区的“天下第一水司楼”,楼高99.9米,共24层,建筑面积超6万平方米,对外宣称申报了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集会展博览、酒店住宿、游览观光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主体建筑远观气势恢宏,可走近一看却大跌眼镜,里面乱七八糟堆放着建筑材料和垃圾,处于烂尾状态。一些过路游客边拍照边叹息“可惜了”。

潘志立主政时,还在这个贫困县里规划建设大学城。根据当地官网介绍,“独山大学城”规划容纳10所大学,在校学生8万至10万人,总

投资概算约135亿元;入驻“独山大学城”开办分校的除了黔南州本地学校外,还有北京及国外一些高校。

然而,记者在“独山大学城”东、西校区走访发现,除了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等少数几所县外学校还在开办外,主要聚集着独山本地学校。记者随机进入一幢挂着“贵州XX学校独山校区”牌子的教学楼,已是人去楼空,部分教室贴着封条。教学楼、宿舍楼规模很大,但质量堪忧,有的房屋底层已出现断裂。

位于县郊的西南职业教育基地是个高层建筑,远远就能看到,然而这个规划投资2.5亿元、用地面积超5万平方米的项目已停工多时。一位工地看管人员告诉记者,项目2019年初就停工了,原因是“付不起工人工资”。

2015年4月,梁嘉庚从独山县县长任上调任三都县委书记。三都县是深度贫困县,然而,梁嘉庚不关心民生疾苦,却一门心思扑在干神广场、两江神岛、云上书院及赛车场、赛马场、斗牛场等“大项目”上。

2019年早些时候,记者曾驱车前往三都县,一下高速就能看到主干道两侧各种造型奇特的大型雕塑、路灯。站在县城最高处,能看到林地里、农田上大大小小的工地,到处是触目惊心的烂尾工程。在水书广场,酒店、商业中心等建设已停工,四处断壁残垣、残砖碎瓦,成了村民放羊的场所。位于县郊半山腰、计划投资4.6亿元打造的云上书院,已人去楼空,工地上荒草半人高。

“一把手”恣意妄为令人震惊

独山县、三都县都是贫困县,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但潘志立、梁嘉庚为了给个人主政生涯“戴高帽”,没把精力花在脱贫攻坚上,却把心思用在搞政绩工程上。

在独山县,潘志立独断专行,“一把手”俨然成了“一霸手”。在三都县,梁嘉庚也有相似的口碑,他的话就是规矩,“他决定的事,没人能阻止。”一名曾与梁嘉庚共事的干部告诉记者,没有前期研判、没有相关手续,项目想上就上,很多都是要推动实施时班子成员才知晓。

三都县一位干部说,梁嘉庚决策思路天马行空甚至荒唐。比如,他曾计划在云上书院建成后,人们上去要坐直升机,还要建个大电梯直通县城。

“老百姓生活还很困难,但梁嘉庚的心思全在大拆大建的‘政绩工程’上,上行下效,一些基层干部也跟着他学,群众意见很大。”三都县一名干部说,梁嘉庚、潘志立落马后,三都县和独山县均有多名领导干部接受审查。

据了解,为凸显“政绩”,潘志立安排独山县8个乡镇每2个月轮流举办一次项目观摩会,每次花费在60万元至100万元左右。2016年以来,梁嘉庚主导实施的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有127个,但与脱贫攻坚有关的只有41个。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天下第一水司楼”的修建,让独山县影山镇翁奇村一些村民失去了土地。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她家的土地被征用,新修的房屋被强制拆迁,家里的猪、牛不知去向,“田地没有了,把我们农民害苦了。”

“大干快上”的政绩工程透支了地方未来发展的财力。潘志立任独山县委书记8年多时间,到被免职时,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的独山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政绩工程热”如何“退烧”令人深思

“顾罔民生、恣意妄为、我行我素”,这是

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刊文对潘志立、梁嘉庚的评价。在潘志立、梁嘉庚眼中,脱贫攻坚费时费力出不了成绩,只有搞项目才能彰显政绩。

在盲目上项目的同时,两人还大肆收受财物。安顺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称,潘志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梁嘉庚在一审判决中也被指收受财物,受贿金额折合人民币300余万元。

目前,贵州省纪委监委针对潘志立案、梁嘉庚案已开展“一案一整改”工作。例如,独山县开展“抓脱贫、强化解、保稳定、促发展”专项整治,三都县则针对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进行全面自查整改,对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教育医疗等6类“必须为”的项目,加快推进;对特色城镇建设、园区工程等13类“暂缓为”的项目,稳妥推进;对大公园、大赛场、大牌楼等6类短期内不能惠及群众的“不能为”项目,坚决停止。

有关专家认为,脱贫攻坚战到了最后时刻,必须警惕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地方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要有正确的政绩观,踏踏实实抓利民惠民的实事,抓小抓细,务求实效;切忌好大喜功、华而不实。

长期研究行政管理的长安大学教授刘吉发认为,为防止地方党政“一把手”权力过大、随意决策,应当制定并公开“一把手”的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此外,受访专家建议,对于重大项目实施,重要干部任免等必须实行集体决策,监督权力运行,促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依法、依规用权。



高铁乘务员 培训迎春运

1月6日,乘务员在进行直臂手势指引礼仪培训。

2020年春运即将拉开帷幕,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客运段动车一队组织动车组乘务员进行基础业务、妆容礼仪等方面的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新华社发
(黄伟摄)

2020年了,去年没休完的年假怎么办



据新华社广州1月7日电(记者胡林果、黄奎、杨思琪)2020年元旦刚过,“2019年未休年假能在春节前休吗?”“未休年假能否要经济补偿”等话题再度引起热议。

“跨年休假”有必要吗?哪些劳动者跨年休假更不容易?怎样让休假安排为劳动者带来更多获得感?新华社记者就此赴多地采访了相关人士。

劳动者有跨年休假需求 但落实规定仍存困难

“上个月中旬休假的机票都买好了,结果硬是因为年底工作太多没走成。”在广东一家民营企业就职的肖女士对记者说,“我准备春节前后把假补上”。

新华社记者在北京、广东、黑龙江等地随机采访了数十名各类岗位劳动者,能像肖女士这样顺利实现跨年休假的并不多。

现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年休假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等多名专家告诉记者,“年休假一般不跨年”这一制度设计是为了充分尊重和保障“大劳动者的休假权。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田思路说,年内休假的原则是防止“带薪休假制度实施过程中,用人单位故意拖延、阻碍劳动者休假”,另一方面规定也明确允许了跨年休假的“例外”情况。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允许跨年休假的“例外”规定落实不易。黑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李亚兰对此解释道,根据相关规定实际上把跨年安排休假的决定权赋予了用人单位。如果用人单位“作梗”,劳动者很难自主安排休假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带薪年假,可以休且可自主安排”的劳动者仅占三成多。

快递、电商等新业态劳动者“跨年休假”更难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多项现实原因造成了劳动者实际感受与制度初衷之间的差距。

——有部分企业“套路”劳动者。“2019年5天的年假单位只给了1天,又不能跨年度补。”广州一家自动化企业员工刘某无奈地说,“根本不敢跟公司‘杠’,除非是不想干了。”北京一家知名大型企业职员孙女士告诉

记者,公司年假每年元旦“清零”。如果有员工提出跨年休假或者未休假“兑现”申请,“人事总有办法让我们自负未休假的责任。”

当前,多数情况下,相对劳动者,用人单位掌握着更强的话语权。广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欧卫安说,针对劳动者关于跨年休假或是未休年假“兑现”等合理诉求,部分企业往往不是依法要求考量“是否必要”,而是一概以“效益不好准备裁员”“未能休假后果自负”等方法“套路”劳动者。

——有些岗位类型跨年休年假。“每年春节前大家会给亲戚朋友邮寄东西,所以会更忙。”在哈尔滨市工作的快递员小哥小张告诉记者,每年“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基本上连在一起,很难抽出一段时间集中休息。他说,快递员工作强度很大,在快递员相对较少的片区,快递员可能能休假,但是在件多的片区就很难保障。

近年来,快递物流、网络送餐、电子商务等新业态领域发生的劳动用工问题明显增长。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仅快递业2018年各地查处的涉及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类案件就达0.66万件。相关部委表示将以快递业为重点,适时开展落实休息休假情况专项执法检查。

记者还了解到,当前像网约送餐员等岗位劳动者大量属于劳务派遣人员,与相关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模糊,难以明确和保障休假权利。类似情况也发生在电商类企业。

劳动者期待落实并增加休假自主权

多名专家告诉记者,带薪休假总天数偏少,劳动者休假自由度偏低是近年来“跨年休假”等问题屡屡引发社会热议的根本原因。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解决相关问题的现实紧迫性越来越凸显出来。

“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自己不能倒。”近年来,随着陪伴家庭、看护老人等需求不断增加,对入职十年内的青年劳动者而言,5—10天的年假总量及不够灵活的休假时段让他们感觉捉襟见肘。不少受访者向记者表示,一方面希望能够细化年假递增的时间段,让年假增长更可感;另一方面则希望相关法律法规作出调整,为劳动者更自主地安排休假时间提供明确依据。

记者发现,当前一些企业将同意员工在正月十五前报休上年未休年假作为“隐性福利”,受到员工欢迎。在北京、广东等地,部分互联网企业已将年假申报期限调整到24个月,增加员工休假自主权。

“应该根据我国文化传统,在逐步合理增加带薪休假天数的基础上,赋予劳动者更多的休假自主权。”专家表示,注重落实休假自主权是对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尊重。对劳动者而言,更高质量、更加自主的休假,更能增加获得感和幸福感。(参与采写:胥兆瑞)

阳光、沙滩、美女成为吸粉“法宝” 网红一周变现近30万元

记者检索多家直播平台发现,目前带有“三亚沙滩”等字样的直播数量有所减少,但在各类直播平台中,海南三亚依然是备受受欢迎的直播背景之一。网络直播缘何热衷于三亚景区?

一名直播行业从业者介绍,三亚大东海、三亚湾等免费开放,而且吸引了大量国外游客。最初来这里进行直播的网红,主要靠拍摄俄罗斯等国外游客“吸粉”。后来有人发现用“阳光、沙滩、美女”做背景,粉丝量会迅速上蹿,引发其他主播纷纷效仿,最终形成了“十步一网红”的景象。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利益驱使。记者了解到,粉丝的关注度是直播平台获取资金的关键,网络主播的收入取决于打赏和虚拟礼物。一位在大东海直播的冯先生告诉记者,粉丝“打赏礼物”必须与直播平台按一定比例分成。此外,主播可通过平台帮助商家发广告赚钱,或者售卖商品。“不少主播都是平面模特出身的,一些品牌方会聘请她们拍杂志图、广告图、淘宝商品图等,这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冯先生说。

据三亚市旅游市场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2019年国庆假期,一名网红来三亚短短一周,就盈利近30万元。该网红不仅拥有自己的房车,还携带着十几人的团队。

“网络直播的成本较低,没有严格的准入门槛。”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学院教授张春河表示,直播行业的乱象涉及心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但说到底,还是为了牟利。在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下,为了“吸粉”变现,网红哗众取宠,甚至大搞低级趣味。

直播当守规矩 底线不容踩踏

三亚向网络直播骚扰说“不”,引发社会广泛共鸣。不少网友呼吁还需进一步规范引导直播行业,倡导主播文明直播,尊重自己和他人的。

“目前主要问题是取证难,对扰民的界定不好把握。”受访的一位基层干部表示,此前有一名主播未经同意,占用大东海某海鲜店的餐桌进行直播。店主出面干预,遭到该主播威胁,扬言要在直播平台上称该店为黑店。执法部门与其交涉时,由于没有现场视频,难以判定结果。

一位执法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现阶段出台的多是通知、办法、规定等,位阶不高,能实施的处罚力度也相对较小,对违法违规人员的威慑力不足。他建议将网络直播的法律位阶适当提高,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关法规条例,在执行上有法有据,以便对后续打击惩处网络直播乱象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处罚的领域和力度也更加宽泛,威慑力更强,效果也更加明显。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杨琳表示,网络直播满足了草根自我表达的意愿,传递健康内容,网络直播行业大有可为。但直播行为不该突破道德底线,更不该违反法律法规。

“关键在于规范引导。”宋秀军表示,治理户外、景区的骚扰式直播,仅靠巡查人员的规劝,远远不足以震慑打击的不文明直播。直播平台要严格直播人员准入机制,提高准入门槛。比如,直播人员上岗前要进行培训,提升个人素质;各直播平台也要建立联合监管机制,追查违规主播的真实身份,防止该账号在一个平台上关闭之后又活跃在另一个平台上。

杨琳表示,加强线上线下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严禁违背他人意愿的直播行为,应当成为人们心中的共识。

三亚直播乱象明显减少,根治需持续发力

据新华社海口1月7日电(记者李金红、王自强)强行搭讪中外游客、未经许可擅自尾随游客跟拍、大声喧哗扰民……日前,三亚发布旅游旺季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加强对大东海景区直播现场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各类不文明直播行为。

记者近日在三亚大东海景区走访发现,昔日网红主播扎堆的情况有所好转,打扰游客等不文明直播行为明显减少。受访的游客和专家表示,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持续发力,引导直播行业健康发展。

低俗直播被劝诫离场 大东海“十步一直播”已难觅踪迹

三亚市旅游市场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自2019年四月份以来,各类网红主播涌入大东海景区,并在10月至11月达到最高峰。大东海旅游区沙滩全长约2.6公里,一晚有近200名网红在这片沙滩上同时进行直播,几乎十步就能见到一主播。

三亚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监宋秀军无奈地说:“网红在直播时往往携带音响等扩音设备。由于做直播的人太多,为了掩盖他人的声音,许多网红高声嘶喊,将设备开到高音量扰民。”

宋秀军告诉记者,为吸引眼球,许多网红身着奇装异服,以古怪低级的方式突出自我;一些主播男扮女装,现场“走秀”;一些女主播则衣着暴露,打色情擦边球;一些网红为追求点击量,哗众取宠,公然在沙滩上做出不雅之举。

据三亚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中心统计,自2019年6月至今,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受理涉及大东海直播投诉共214件。投诉主要集中在直播中存在噪音扰民、骚扰游客、内容低俗和影响市容市貌等。

记者了解到,三亚出台整治方案后,大东海旅游区采取了多项措施,成立巡查队伍劝阻不文明直播人员,元旦假期直播人员打扰游客现象已明显减少。6日晚,记者来到三亚大东海走访发现,昔日网络主播扎堆的现象有所好转。一位19岁的专职网红主播告诉记者,三亚开始整治后,不少同行也意识到此前的一些行为“出格”,“扰民式”直播遭遇工作人员劝诫后,已有不少同行选择了离开。

阳光、沙滩、美女成为吸粉“法宝” 网红一周变现近30万元

记者检索多家直播平台发现,目前带有“三亚沙滩”等字样的直播数量有所减少,但在各类直播平台中,海南三亚依然是备受受欢迎的直播背景之一。网络直播缘何热衷于三亚景区?

一名直播行业从业者介绍,三亚大东海、三亚湾等免费开放,而且吸引了大量国外游客。最初来这里进行直播的网红,主要靠拍摄俄罗斯等国外游客“吸粉”。后来有人发现用“阳光、沙滩、美女”做背景,粉丝量会迅速上蹿,引发其他主播纷纷效仿,最终形成了“十步一网红”的景象。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利益驱使。记者了解到,粉丝的关注度是直播平台获取资金的关键,网络主播的收入取决于打赏和虚拟礼物。一位在大东海直播的冯先生告诉记者,粉丝“打赏礼物”必须与直播平台按一定比例分成。此外,主播可通过平台帮助商家发广告赚钱,或者售卖商品。“不少主播都是平面模特出身的,一些品牌方会聘请她们拍杂志图、广告图、淘宝商品图等,这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冯先生说。

据三亚市旅游市场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2019年国庆假期,一名网红来三亚短短一周,就盈利近30万元。该网红不仅拥有自己的房车,还携带着十几人的团队。

“网络直播的成本较低,没有严格的准入门槛。”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学院教授张春河表示,直播行业的乱象涉及心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但说到底,还是为了牟利。在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下,为了“吸粉”变现,网红哗众取宠,甚至大搞低级趣味。

直播当守规矩 底线不容踩踏

三亚向网络直播骚扰说“不”,引发社会广泛共鸣。不少网友呼吁还需进一步规范引导直播行业,倡导主播文明直播,尊重自己和他人的。

“目前主要问题是取证难,对扰民的界定不好把握。”受访的一位基层干部表示,此前有一名主播未经同意,占用大东海某海鲜店的餐桌进行直播。店主出面干预,遭到该主播威胁,扬言要在直播平台上称该店为黑店。执法部门与其交涉时,由于没有现场视频,难以判定结果。

一位执法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现阶段出台的多是通知、办法、规定等,位阶不高,能实施的处罚力度也相对较小,对违法违规人员的威慑力不足。他建议将网络直播的法律位阶适当提高,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关法规条例,在执行上有法有据,以便对后续打击惩处网络直播乱象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处罚的领域和力度也更加宽泛,威慑力更强,效果也更加明显。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杨琳表示,网络直播满足了草根自我表达的意愿,传递健康内容,网络直播行业大有可为。但直播行为不该突破道德底线,更不该违反法律法规。

“关键在于规范引导。”宋秀军表示,治理户外、景区的骚扰式直播,仅靠巡查人员的规劝,远远不足以震慑打击的不文明直播。直播平台要严格直播人员准入机制,提高准入门槛。比如,直播人员上岗前要进行培训,提升个人素质;各直播平台也要建立联合监管机制,追查违规主播的真实身份,防止该账号在一个平台上关闭之后又活跃在另一个平台上。

杨琳表示,加强线上线下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严禁违背他人意愿的直播行为,应当成为人们心中的共识。